

回忆左恭同志，他为图书馆界的协作历尽心劳

鲍振西

左恭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1976年7月30日上午，当我得知左恭同志因病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的时候，感到十分悲痛。我立即与北京图书馆的几位同志一起赶到医院，看到左恭同志慈祥的面孔，安然地躺在那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每当我想起或与同志们谈起左恭同志的时候，他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

左恭同志生前曾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一位非常热爱图书馆事业，有坚强事业心，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建设，做出了有益贡献，深受图书馆界尊敬的领导者。

左恭同志对青年满腔热情，寄予深切期望。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帮助。我与左恭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1955年夏天，当时左恭同志刚调到北京图书馆工作，我正结束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的学习。赴苏学习的前夕，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到北京图书馆向领导辞行，聆听指导。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他对我的热情鼓励和殷切期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7年夏天，左恭同志率领中国图书馆代表团到苏联参观访问，我当时正在莫斯科国立图书馆学院学习。有几次，我随同代表团参观访问了莫斯科的一些图书馆。左恭同志每次参观访问都是认真地听、仔细地记。代表团回国后，根据参观访问记录编写出版了《参观苏联和民主德国图书馆事业报告》（由左恭、杜定友、汪长炳、胡耀辉等人编写，原载1957年《图书馆学通讯》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一书，记录了代表团的见闻与观感。这是我所见到的建国以来，我国图书馆界出国考察访问，编写出版的一本

专书。这本书的出版，与左恭同志和其他代表团成员杜定友、汪长炳、胡耀辉同志辛勤劳动，认真考察，详细记录，分析整理分不开的。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左恭等老一辈同志们对待工作，对待事业的严肃认真的态度。

在左恭同志革命的一生中，从事图书馆工作只有十多年的时间，应当说是不长的。由于左恭同志对图书馆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和意义，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把它看成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尽管在实际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也听到一些不理解这项事业的人的非议，也从未动摇过左恭同志热爱图书馆事业的信心，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困难。当有的人对他热心搞图书馆界的协作说他是“好大喜功”时，左恭同志很明确地回答说：我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有什么不好？！在短短的十多年中，左恭同志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建设，特别是在推动图书馆界的协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馆际协作，文献资源共享”，是当代国际图书馆界共同关心和注意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我国是开展图书馆界协作较早的国家之一。左恭同志也可以说是我国图书馆界开展协调与协作活动的倡导者与组织者之一。

积极倡导图书馆界协作

左恭同志调来北京图书馆工作不久，便积极参与制订开展图书馆界协作与协调工作的规划。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之后，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

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并指出：“要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的进口工作，并且使现有的书刊得到合理的分配”。为了落实中央指示精神，在周总理、聂副总理领导下，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国家科委的前身），讨论制订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左恭同志参加了这个《方案》的起草工作。这个《方案》1957年10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根据这个《方案》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图书小组，负责全国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图书馆工作的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的工作。左恭同志是图书小组副组长。根据《方案》的要求，成立了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并把一些藏书基础好、规模较大的图书馆确定为各系统的中心图书馆，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成立了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和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并在武汉、沈阳、南京、广州、成都、西安、兰州、天津、哈尔滨等地成立了九个地区的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从此，我国图书馆界的协作与协调工作，进入了有领导、有组织的时期。左恭同志在图书馆界的协作工作中起到了倡导作用。我记得，1963年在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在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代表小组会上，左恭同志曾反复地强调各系统图书馆之间、图书馆与科技情报界之间协作与协调的必要性。他说：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每个馆都不能也不应单干，要互通有无，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藏书的作用。左恭同志的这一提法在今天图书馆界搞好协作与协调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努力组织图书馆界协作

左恭同志作为图书小组副组长、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贯彻落实

《全国图书协调方案》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筹备和成立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筹备成立图书馆红专大学，筹办中外文图书统一编目工作，组织外文书刊采购协调，组织多余书刊的调拨，清理积压的书刊等等。这些大多是开拓性的工作，万事开头难，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克服各种困难。很多工作都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前进的。这些新开创的事业，除了要确定方针任务外，还要抽调人员、安排房子，编印中外文图书统一编目卡片，还要有合乎要求的纸张。这在困难的六十年代，要解决这些问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左恭同志不辞辛劳，不怕碰钉子，到处奔走，多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使这些有利于图书馆事业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在左恭同志的主持下，全国联合目录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各系统和各地图书馆的协作下，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先后编辑出版了《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全国西文期刊联合目录》、《全国日文期刊联合目录》、《全国俄文期刊联合目录》和二十多种全国性的专题联合目录，并定期编印出版《全国西文新书联合通报》等。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国联合目录工作的最好时期，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这么多的成果。这些联合目录至今仍是各大图书馆必备的参考工具书。图书馆界每当说起这个时期的联合目录工作时，便由衷地怀念和感谢对这项工作付出了心血的左恭同志。

左恭同志对书目工作非常重视。我记得1962年，在左恭同志领导下编制北京图书馆的七年规划时，他就提出了要把编辑善本书目、线装书目、建国前出版的图书目录等列在规划之内。我听说，当1975年4月左恭同志恢复自由后，不顾身体受到伤害，不求名义，急于了解图书馆几年中的变化情况，要求参加力所能及的工作，多次提出担负编辑书目的工作。左恭同志这种热爱图书馆工作，热

爱书目工作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左恭同志不仅关心图书馆界的协作，同时也非常关心图书馆与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之间的协作。在1963年初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代表小组有些同志谈到，图书馆与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之间，有些工作不够协调，在采购书刊等方面分工不明确，出现一些扯皮现象时，当时主持小组会的左恭同志，便委托参加会议的代表——武汉地区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张遵俭同志，连夜起草了《关于图书馆与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分工协作的建议》（草案）。虽然，这个《草案》没成为正式文件，但它的基本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如图书馆以收藏书刊为主，科技情报研究所一般不收藏图书，以收藏特种技术资料为主，外文期刊订购品种进行必要的协调等等），至今仍在有些地区执行着。

左恭同志对于清理积压书刊的工作非常重视，抓得很紧。他认为把有用的书刊资料积压起来，不能利用是不应该的。因此，当在小组会上了解到，有些图书馆和科学技术情报单位书刊资料积压现象严重，利用率低，甚至根本无法利用的情况以后，左恭同志积极参与了起草《关于清理科学技术书刊文献的决定》的工作。这一《决定》于1963年4月15日作为国家科委和文化部文件下发各有关部（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科委、文化厅（局），要求在1963—1964年内，国务院各有关部（局）和省、市、自治区以上的各级科学技术情报机构，以及一切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成员馆，必须把现有积压的中外文科学技术书刊文献，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理。要求把积压的书刊文献全部加以登记，编出目录，整理上架，提供科学技术人员利用。为了统筹安排和督促检查这项工

作，成立了“科学技术书刊文献清理工作小组”，左恭同志是工作小组的六位成员之一。各部门、各地区的图书馆根据这个《决定》，进行了清理积压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为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多的参考资料。

为了学习各地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工作经验，加强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之间的联系与协作，在左恭同志的倡议下，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组织了三个学习参观组分赴各地。左恭同志亲自率领一个组赴东北地区学习参观。这次活动，不仅交流了情况和经验，而且扩大了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影响，促进了图书馆界的协作。

上面写的只是个人的一些片断回忆。左恭同志对图书馆界协作的贡献，远不止这些。

左恭同志在担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期间，为北京图书馆的发展、业务建设、培养人才、国际交往等方面，也都作出了很多贡献。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980年党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以后，我国图书馆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图书馆界的协作，虽然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不但有了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但是，从整体来看，应当说，还没有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使我们深切地怀念为倡导与组织我国图书馆界协作作出极大贡献的左恭同志。我们应当学习左恭同志那种为了图书馆事业，顾全大局，不怕困难，努力开拓协作工作的精神，把我国图书馆界的协作进一步搞好，使图书馆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中，做出新的贡献。

1986年8月1日